

还是要活着,尽管“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向死亡更近地行走着”。

而活着,就要繁衍、传承、挣扎、守望,像沙卜台的英莲,这个和《红楼梦》中香菱本名相同的女人,用一生守望那无望的爱情,但生命里总有一种意义或者信念值得我们去这样做,不论在城市、乡村还是大地边缘的角角落落,守望无处不在。

文学的唯一意义,大概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挖掘生活的真实。这两个真实是两码事,因为生活是一个捉迷藏者,总是用一些投影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有人看到表象,有人捕捉本质,没有一个生命可以透彻地理解生之为何,死之为何。

胥得意挥舞着潜意识之锹,在记忆碎片里挖掘他的村庄和每一条生命,他不是给村庄立一个墓碑来祭奠它,村庄尚未死去,在他的心里永远不会死去,他听到村庄在辽西的大雪之下微弱的呼吸声。他不是为了那些原生态的村庄文化而写,也不是为即将消逝的农耕文明写一份悼词,村庄对他而言,是生命的根、生命的开口。他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伸出一只渴求的手,伸向村庄那自由而新鲜的空气。

封闭的村庄是对立告诉我们人生有多么困惑,我们囚禁其中,永远找不到答案。人类囚禁在太阳系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以光速逃离这个黑暗与光明共存的世界。

在胥得意那些不能自拔的叙述和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一份份疼痛,来自文化、民族、精神、生命……这些疼痛纠缠在一起,含混、忧郁、绵长而又憔悴。

他这样写只是为了寻找答案,生命的答案,这些答案掩藏在老曹、忠孝、小宽、积发等一个个土气而渺小的名字里。好像他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好像我们这样有文化的人是迷惘者,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走进窄门,捕捉一缕希望之光。

胥得意笔下的微村庄如此之小,只有13户人家,81口人,却呈现了一个庞大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上锁的,尽管在众多即将消逝的村庄中,它一定是消逝得最快的,但有些东西依然值得保存,甚至珍藏。对胥得意而言,只有找回这个村庄,他的精神原乡,才能在迷惘的城市里找回自己。

而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如何找回自己。在那个奇特的微村庄中,奇特的小人物身上,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份恒久的美,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以至于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仰望一下他们。

生命是对完整世界的一份守望

生命总是在攫取什么,哪怕家财万亿,总是有一种巨大的虚空需要填补。人需要一个完整世界,而世界是不完整的,对故乡的思念被现代文明的冲击打断,对爱情的渴望被世俗的道德观打断,对生命的敬重被地位的高低打断,就像无处不在的噪声,总是不期而至,倏地打断内心中那份和谐的宁静。

完整世界总是存在于理想中,对骆驼来说,绿洲就是一个完整世界,看到它,可以迈开长长的腿奔跑。只要是人,都会有种生命的冲动,黑暗中飞翔一般,扇动,飞翔,扑向火。完整世界只存于内心中,是获取幸福的唯一途径,这种对幸福的判断标准和外部世界的判断标准是截然相反的,以世俗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答案永远是错的,因为,你不懂。

贾英莲是沙卜台唯一拥有完整爱情世界的人,她没有完整的家庭,却有完整的爱情。在二姨的眼里,贾英莲活得不容易,可怜可惜,让人疼。但是,假如让贾英莲和沙卜台那些家庭完整的女人换一下位置,她未必肯,她要的是爱情,不是婚姻,在她看来,沙卜台的其他女人是没有爱情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在沙卜台的人眼里,贾英莲是一个爱情的受骗者,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可是

曹林光的长篇小说《半岛的月亮》真实地反映了雷州半岛从1950年到1975年这20余年的沧桑巨变,展现出雷州半岛的农民新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而这块红土地上两代农民的传奇故事,构成了目前这部作品宏大的新中国乡村叙事。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以李奇为代表的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新农民,他们经历了获取土地资源、参与解放海南岛战役、组建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社、灭掉逃亡到香港的反动地主李三泰的种种反扑阴谋等事件,也经历了人民公社食堂从兴旺到衰落的全过程。从大炼钢铁破坏了林业生态,到改良果树、推广蔗林,一直到远洋捕捞;从计划生育到推荐回青年上大学;从两代青年农民的情感纠葛到策划新农村的集体婚礼;从一个民兵排排长成长为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表率……这一幕幕几乎已被年轻一代遗忘了的中国南疆的乡村历史,通过曹林光的文学叙事,有了既生动又概括的精彩展现。

雷州半岛解放后的头20年,两代新农民迅速成长为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一个人的情感变化,每一个人的个性命运,都组成了我们在其他农村长篇作品中看不到的、打上那个独特时代印记的乡村传奇故事,这样个性化的独特叙事视角,都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个时代转型密切相连。可以说,《半岛的月亮》叙述的中国新农民的传奇故事,反映了时代的转型变迁,也反映了中国新农民的成长之路。这些已成为历史的半岛农民的个性和命运,被曹林光站在今天改革开放、扶贫奔小康的新时代的角度,重新做了审视和认知,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体验。《半岛的月亮》讲述的雷州半岛解放后头20年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中国农村发展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扶贫攻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前兆。那一个个移

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评胥得意《沙卜台》 □邓迎思

没有得到娶她进家门的承诺,未婚生子,孤苦伶仃。在那些偏僻的村庄,光棍甚多,哪怕是带着儿子的寡妇,只要想嫁,一定有人要。可她没有,她带着儿子过了一辈子。

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为那个已婚男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养不起,送了人。必须要提的是,她从来没有灌輸一点让儿子恨亲生父亲的观念,她死后,儿子还是认祖归宗了,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相见。她没恨过那个不肯娶她进家门的男人,而那个男人未必是欺骗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离不成婚,娶不了他真心相爱的女人。他们之间有种默契,一种建立在苦难与相偎、残缺与完整之上的心有灵犀,对他们而言,爱就是全部世界,为了爱,可以忍受各种煎熬,守下去。

如果贾英莲的爱情世界不是完整的,那么,她就不会活得那么坦然、自信。她一生都在守望这份爱情,从没有让它破裂、残缺。我们没有从她的眼神里,一举一动里读到恨,某种程度上,她像《廊桥遗梦》里的弗朗西斯卡守望罗伯特一样,孤独而又幸福地守望着爱情。她也会唧唧呀呀地唱,发泄一下心中苦闷,但这种苦闷,是来自于家庭的残缺,而不是爱情的残缺。何况,在沙卜台这个微村庄,人心质朴得可爱,没有人责备她,没有人唾骂她,她在村庄里很受尊重。所以,她是幸福的,一个懂得爱的女人,难道不幸福吗?要知道,很多完整的家庭,爱情正在一点点残缺。甚至一些因条件而结合的婚姻,是没有爱的。贾英莲是拥有过真正爱情的人,她来过,她爱过,对她来说,就够了。

而这种守望对于作者来说亦是如此,只不过他守望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友情、乡情。胥得意的书写事实上是散漫的,写着这个带出那个,像一股浓稠的汤汁淌过。无论是有关亲关系的,还是没有姻亲关系的,他都充满感情,每一个小人物,都是他心中熬不化的一块冰糖。

因为沙卜台就是他的完整世界,一个物质贫穷匮乏而精神单纯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干净的、透明的。而这样的人际关系,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在沙卜台,人活得更像人。人是本质意义上的人,活着就是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感轰鸣,谱成一曲绵长舒缓的音乐,在慢时光的流动中,每一个细胞都是舒缓的。

所以,胥得意不是在保存沙卜台,而是在保存自己。他要保存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一个可以让人放逐灵魂的沙卜台”。他不被物质所累,能够坦然地活着,“活给自己的理想,活给自己的内心,没有悲伤,没有忧愁,没有恐慌,没有绝望,没有痛苦,没有计较,没有卑鄙,没有对富贵的渴求,只有对未来的渴望”。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对完整世界有一份执著的守望。

生命是一种拓展的宽度

沙卜台很小,但并不狭隘,沙卜台的人是懂得宽容和谅解的。生命的宽度如果仅仅是一种道德,那是远远不够的,生命要有爱,不分性别、民族、肤色的爱,跨越阶级和国界,爱每一个人。

事实上,传统文化下的村庄是狭隘的,但沙卜台并没有多少农耕文化,所以胥得意的文本并不是为了保存农耕文明与传统文化,他只是保存一份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沙卜台这个村庄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地处辽西和内蒙古结合部,是满汉蒙古多民族的结合部,这个村庄的姓氏很多,并不是像传

统的汉族村庄那样,以一两个姓氏为基础建立,所以没有浓重的家族观念,而是一个移民村庄。传统汉族村庄常常是以一个姓氏为基础,比如张家村、李家村、赵家村等等,典型的比如“于家石头村”,是明代忠臣于谦的后代建立的,清一色的于氏家族文化,虽然坐落在河北井陘,但是有许多江浙文化。而沙卜台的多数人是为了避难、避乱移居到这里来的,是“秦人旧舍”“武陵源”,一个现实中的世外桃源。因为偏僻,得以乱世中生存;也因为偏僻,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它将默默地消失。

传统村庄文化是带有浓重的家族主义色彩的,常常为了利益和其他姓氏产生矛盾和冲突,比如客家人和当地人的争斗,百年不息。不论家族保护主义,还是民族保护主义,都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家族主义是狭隘思想诞生的根源,也是小农意识的根源。

但沙卜台看不到这种利益之争,它太小了,小得必须互相扶持才能生存发展。它小到没有路,路掩盖在荆棘和野草之中。沙卜台是有爱的,比如二姨,总是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别人的苦难,而不是在背后和其他女人说三道四,捕风捉影。沙卜台的女人虽然也会三五成群,张家长李家短,但是她们没有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讽刺、挖苦别人,她们的言谈是善意的。

无论是自觉的善意,还是非自觉的善意,都能留下一份长长的感动,比如老曹在大雪天为孩子扫出的那条三四里的小路。的确,老曹是为自己孩子扫的,他是自私的,但是我们却没法说他自私。因为他在扫这条路的同时就知道,不只是他家的孩子走,别人家的孩子也要走。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家孩子凭什么占我的便宜,你们应该跟我一块扫雪。

然后就出现了一种拓展的善意,路是我为自家孩子扫的,但你们也可以走。我的孩子享受我的爱,你们也可以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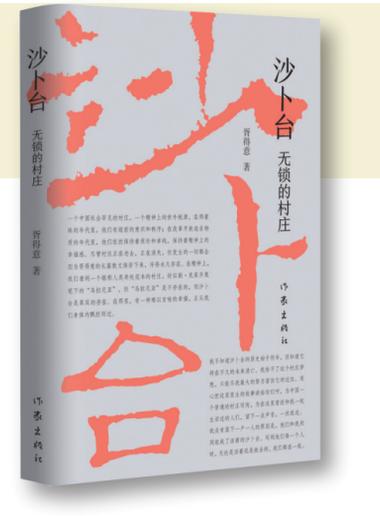
然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这种拓展的爱,反而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爱来得更自然、更美好。假如老曹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是一个精神极为高尚的人,我们会发现,这种道德会有一种强制力,它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他人,老曹无私,大家也应该无私。就像灾难出现的时候,他捐款,你们也应该捐款,否则就是不道德。

在沙卜台,没有道德绑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老曹自私而又充满爱,为他的孩子扫出一条路,别的孩子同样也得到了爱。这就是沙卜台的村庄文化,一个很小的村庄,它的文化却有超越一般道德的善与美。这样小一个村庄,拥有更高一层的对爱、对善的理解,它存在,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研究、去感受,真的很美。

甚至沙卜台的小孩子,他们之间也没有家族保护主义,没有帮派。他们之间打架,都是带有欧洲决斗色彩的打架,谁的矛盾谁解决,两个人自己解决,别人不会插手。哪怕亲哥哥,也会站在一旁观战,而不会上手帮弟弟一把。

在别的村庄,这种事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沙卜台太特殊了,一个微村庄,不同姓氏的家族共处,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社会公约,非传统的价值观。就像整个村庄只有一把象征性的、一捅就开的锁一样,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虽然是不同民族混杂的一个村庄,但沙卜台是没有民族之争的,各自遵循民族生活习惯,没有人干涉,也没有人看不顺眼,互相尊重对方。很多没有名的植物,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名字,其他



人就会接受这个名字,比如“一裹辛甜”,好像就该这么叫似的,没有人产生异议。第一个命名者是享有命名权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村庄文化。再如“吕忠孝打盆处”,这个命名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大家都接受了,并且引以为乐。如果说尊重是生命的一种宽度的话,那么沙卜台的生命是非常宽厚的。

13户人家的小村庄,还要划分出一个地主来,这是匪夷所思的事,但在特殊时期,也可以理解,毕竟地主也是有指标的。吕凤来家这样的地主并没有受到同村人的歧视,沙卜台的地主是“地的主人”,谁最勤快,谁拥有的地最多。在偏僻、荒凉、干旱的辽西,只能靠双手去开垦一块块耕地,13户人家,都是拓荒者。

吕凤来由于孩子众多,日子过得比较贫穷,但是依然保留了地主身份的一些习惯,比如门帘上挂铜钱,被面要浆洗。用米汤浆洗的被面,尽管盖起来偏硬一些,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保护被面,并且来年再拆洗的时候可以轻易地去掉油泥。所以地主的生活习惯,并非浪费和奢侈,而是牺牲舒适度,让衣物更耐久一些,实质上是一种节约。

在地主的眼里,只要勤快,沙卜台是能养人的。吕凤来的儿子小宽继承了这种勤快,也继承了宽容的性格。地主家的孩子礼长,愿意和人交往,而不是孤僻、闭锁心灵。整个沙卜台的人都不是闭锁者,他们总是持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自家的瓜果熟了,任别人采摘,打声招呼就行,不打招呼也没人介意的。

胥得意搬到外地后,二姨总是不忘给他捎去些家乡特产的山枣,二姨去世后,三嫂接着给胥得意捎山枣,三嫂去世后,可能会是别的人。沙卜台的人不论姻亲与否,总是惦记着故乡的人,这种牵挂,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拓展。

包容、宽厚、与人为善、与己为善,沙卜台的生命是有宽度的,不仅作者不希望这个微村庄消失,我们也不希望。因为这个小小的村庄,孕育着一些独特的生命观,而这种生命观,恰恰我们当今社会所欠缺的。

生命是一种共享的快乐

中国传统村庄文化,是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是一盘自私自利的散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小农经济的性质,让农民变得局限性颇强,每一株草都要和别的草竞争阳光和养分。

沙卜台恰恰是一个缺乏养料的地方,田地是贫瘠的,土壤不肥沃,流水也不多,可他们有共处的快乐。庞德有一首诗《敬礼》,其中有几句:“我见过渔民在阳光下野餐,我见到他们一家衣衫破烂,我见过他们咧着嘴笑,听过他们粗野的狂笑。我比你们远为幸福,而他们又比我们幸福多倍;鱼在水中乐,连衣服也没有。”

沙卜台的人就像庞德笔下的渔民,他们贫穷

而快乐,比我们幸福许多倍。他们懂得和自然共处,也懂得和人共处,他们营造了一种和谐的氛围,甚至不需要用法律和道德去约束,自发地形成一种共处的原则,平和、礼貌、天真、诚挚。

在这里,“狗和人太熟悉了。村子里的狗都不会叫了,温顺地低着头跑来跑去。”狗不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而是人类的朋友。在文学中,鸡鸣狗吠之声是村庄的标志,但沙卜台没有狗吠,一条条沉默的狗是村庄温和的见证。

在这里,“沙卜台的鱼和孩子们一同游泳,水是同一河水,生命与快乐同游。”鱼也能感受到孩子的快乐,孩子也能感受到鱼的快乐,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在这里,“沙卜台的花和人们共同呼吸,花是扎根在这里的生命,年年开放,观望着人人来去。前一年还是采摘它的人,说不准第二年就匍匐在它的身旁了。”沙卜台正在老去,正在消失,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消失的老人,是和花葬在一起的。他们生于自然,葬于自然。

一场雨水冲刷出的水坑,成为天然的浴池,你占这个坑,我占那个坑,没有人争抢,总是服从于天然秩序,谁先发现就是谁的。

“沙卜台的树和人是一样的,不惧怕孤独,安然地生活的;沙卜台的树和人是一样的,沙卜台的人少,男女老少都有。树少,却不缺少品种,哪怕有一些树仅仅一棵。”沙卜台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植物品种繁多;人口虽然稀少,但姓氏繁多,各种各样的基因都存在。就像那些不同的树木能在木匠沟和谐共处一样,不同的姓氏也能够 在村庄和谐共处。木匠家是唯一种了葡萄的人,虽然不多,但木匠媳妇总要剪下一串又一串分给各家的孩子吃。

沙卜台有种种性,这种文化让他们在潜意识里能够自律,哪怕是一个精神病人。王福玉是一个精神病人,失手杀了自己的媳妇,伤了孩子。但二姨还是劝慰大家,不要记恨一个病人。王福玉出院后,硬是接回了孩子一起生活,此后,无论他怎么犯病,再也没有碰一下孩子。而他哥哥去世后,他大哭一场,理智也一点点回归。能够唤回一个精神病人理智的,是爱,是这种共处的和谐氛围。

即便是抱养来的孩子,在沙卜台,也能感受到亲情,没有人排斥他。人是村庄最宝贵的财富,沙卜台把人看得比物质重要。就像吕化新的家,家是拼凑起来的,但日子不是拼凑的。同样,二姨夫和前妻有一个女儿,二姨并没有嫌弃她,她不但同意二姨夫和大女儿走动,还给了她一份母爱。

这就是沙卜台的人性,以人为本,因此,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能融洽相处。村里的大鳖是作者的父亲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他从未抱怨过什么。父亲打出了全村第一眼井,打井的时候村里的男人都来帮忙,用炸药炸深处的石头。井水打出来后,全村人都视为自己的井,都来这里打水喝。冬天如果打水人不落井水,水管就会冻住。父亲不能向村里人发脾气,只能向妻子发脾气。但井水依然是共享的,不会因为这些麻烦拒绝村人打水喝,这是沙卜台的原则,共享经济,共享快乐。

共有和共享是不同的,沙卜台是一个懂得共享的村庄,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快乐也与他人共享,他们相视而笑同享快乐,和自然同享快乐。

这就是胥得意笔下的沙卜台,一个中国社会罕见的村庄,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在那蒙昧的年代里,他们有超前的意识和秩序;在改革开放追求物质的年代里,他们依然保持着质朴和单纯,保持着精神上的幸福感。尽管村庄正在老去,正在消失,但发生的一切都会因为胥得意的长篇散文保存下来,并将永久存在。

在精神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堪称人类共处范本的村庄,好似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拉尼亚”,但“乌拉尼亚”是不存在的,而沙卜台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正从我们身体内飘然而过。

新中国第一代农民的立体塑形

——序曹林光的长篇小说《半岛的月亮》 □刘海涛

风易俗新风尚的诞生和普及,那一个个在乡村人际关系的激烈冲突中所形成的斗争策略和建设举措,那一个个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所遇到的深层和表层的矛盾冲突,那一项项从种田种蔗到远洋捕鱼的成功经历,都为当今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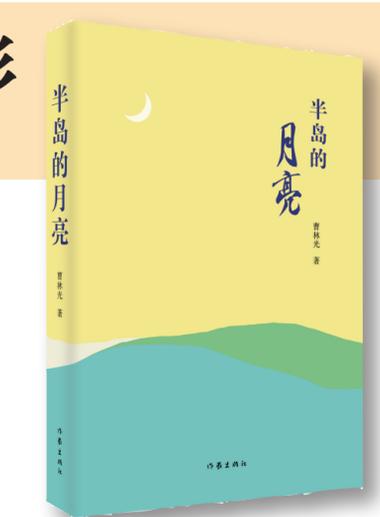
如此看来,《半岛的月亮》虽然仅仅只写了雷州半岛解放后头20年的历史故事,但却对今天时代转型、社会变迁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是在用文学叙事的艺术力量,史诗般地演绎中国“三农”问题的发生与发展,让我们重新感悟了那早已逝去的雷州半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乡村历史,重新体验和审视了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必需的一种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的历史经验。

这部长篇小说集中全部的艺术力量塑造的主要人物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农民李奇。在工作组长、部队转业干部郑昌的培养教育下,李奇迅速成长为一个党组织倚重的骨干,出任了东兴区南吉村的第一任村长。

李奇带领村民办合作社、反击被镇压而潜逃香港的反动地主的反扑,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迅速在中国南疆乡村一穷二白的大地上描绘新生活的绚丽色彩。接下来在抗击各种困难和矛盾的难忘岁月里,他带领乡民们多种经营,种果树、甘蔗,下海捕鱼,兴修水库,参与雷州南渡河塔海工程等,一步步地展现以南吉村为代表

的半岛乡村,逐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的人际关系演变和意识形态出现的新气象、新风尚。李奇敢想敢干、处处为乡民谋利益、为农村谋发展的品德,成为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守初心、谋求发展的代表和典型。曹林光在塑造这个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农民的典型时,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的成功经验——作者不是把李奇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让他贴近历史,回归生活,展现他作为成长中的新农民的真实的一面。正是这样的“二重组合”的写法,没有把故事的主要人物公式化、脸谱化,不是过去那种人物“高大全”的神化形象。这种写法,才能真正地还原真实,写出人性的本相,达到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艺术效果。

这种“二重组合”的写人方法,同样也用在了其他人物群像的塑造中。那个乡村里八面玲珑、老谋深算的命理先生周太公,时时会凭着自己懂点风水知识来哄骗农民,为自己谋取私利,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敬佩李奇一心为公,理解了村里平坟改田的重大工作,临死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生的过错而充满悔意。那个善于做表面文章、会见风使舵的干部吴拔群,最后也被李奇的一身正气感动,为李奇的提拔和命运的改变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新农民苏光宗,既为自己自杀身亡的恋人做出守墓度蜜月的感人之举,也有着这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在面对父母的封建僵化、阻碍自己的爱情时束手无策的无能状。作家写刘艳,既写了她对李奇一往



情深的爱恋,也写了她进城当了妇联干部后情感的质变和对李奇的背叛;既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她离婚时内心惨烈的痛苦和寂寞,也放手写她重逢李奇后的大胆表白……曹林光描写雷州半岛这一群各种各样的农民、干部、妇女、老人,都不是有意地拔高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动机,而是紧扣他们的个性和人物命运,写出了他们真实的性格特点与生活逻辑。正是这样接地气、食烟火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才使得《半岛的月亮》人物群像的立体化塑造,显得真实可信,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赏识。且“乡村恋爱”故事的描写很细腻,富于田园诗韵,令人回味无穷。

配合着这部作品的故事讲述方式和人物塑